



## 格非

## 最好的作品永远在创作中

陈华文

## 中国先锋作家的代表

“格非”是笔名，真实姓名为刘勇。1964年，他出生在江苏丹徒县农村。少年时期，他是个老实、腼腆、与世无争的孩子。在父母眼里，他比较内向，不爱说话，甚至有些沉默寡言。1981年，他考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刚上大学时，格非并不太习惯城市的生活，他无数次想着回到家乡。他怀念爬葡萄藤的茅屋，思念清晨被啼鸟唤醒的光阴。为了缓解思乡之情，他常常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试图从中寻找对于故乡相同的慰藉。同时，他还读里尔克、蒂里希等外国作家的作品排忧解难。长期的阅读使他不仅逐渐摆脱了思乡之苦，而且逐渐爱上了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审美偏好。

上世纪80年代，热爱文学的氛围在大学校园尤为浓厚。当时校园里活跃着各种文学社团，格非也参与其中，和同学们一起探讨诗歌、小说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有时候，他们为了文章中的某个用词，会通宵达旦进行辩论。多年过去后，格非还经常怀念争得面红耳赤的场景。正是在这种氛围里，格非才尝试文学创作。

1984年，格非和同学到浙江去进行方言调查。“打前站”的他，在火车上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在绿皮小本上完成一篇名为《追忆乌攸先生》的短篇小说。当时，他没有想到投稿和发表，完全是自我消遣。几个月后，《中国》杂志的编辑王中忱在华东师范大学召集文学座谈会，格非很羞涩地拿出这篇小说，岂料王中忱特别赏识。不久后，他的小说处女作在《中国》杂志发表。格非万万没有想到，随手写的小说竟然也能发表，这给他后来的创作带来无尽的动力。

格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工作之余，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小说创作中。自从小说处女作发表之后，他先后在《收获》《钟山》《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大型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其中，《迷舟》《褐色鸟群》等小说使他一举成名。《迷舟》以“叙述空缺”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上世纪90年代后，格非在小说创作领域已经卓有成就，他和余华、北村、马原等人，被誉为中国先锋作家的代表。格非在从事教学与创作的同时，还攻读文学硕士、博士学位。攻读文学博士那几年，他几乎停止了创作，在文学理论的世界里神思、遨游。2000年，他凭着论文《废名的意义》，获得博士学位。随即，他离开了求学、工作近20年的上海，转战北京，来到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来都不对现实生活进行简单的描摹，他对所谓的种种技巧和模式也没有兴趣，而倾向于对小说思想性和文本结构的探索。调入清华大学前夕，他在《收获》杂志发表了首部长篇小说《敌人》。小说发表后，被评论家称为“当代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神秘小说”。

在小说创作中，格非从来都不循规蹈矩，总是求新求变，敢于向自己挑战。继《敌人》之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边缘》《欲望的旗帜》。尤其是《欲望的旗帜》，是他第一部关于当代题材的小说。



刊头设计：潘旭涛

他被誉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总是求新求变，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他的作品《江南三部曲》，不久前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到2011年完成的系列长篇小说。他就是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



马得林，男，回族，1949年生，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极乐乡人。先后任中小学教师、教导主任、校长，退休后专门从事青海花儿的编创、研究，现为青海花儿研究会理事。2003年，他编写的《新编大传花儿》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他被文化部确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舍山花儿会）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6月，他参加了文化部举办的第四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舞蹈专场展演；2013年，他编写的《花儿千首漫青海》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花儿”是广泛流行于我国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省(区)11个民族中用汉语演唱的一种山野民歌。它有着独特的歌词格律和音乐旋律，曲调丰富，作品浩繁，是我国民间艺术中的一枝奇葩。

老舍山花儿会，是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在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老舍山举行的大型民歌演唱活动。它产生于明代，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伴随着“朝山庙会”，逐渐从以娱乐为主演变为以娱人为主。

马得林在青海“花儿”的海洋中长大，他喜欢花儿，小时候常常因听花儿忘记拾粪。不知不觉，马得林也学着开口歌唱。开始，乡亲们听见这个娃娃漫野曲并不怎么接受。后来，大人们发现马得林的记忆力惊人，听过的“花儿”几乎人耳不忘，而且他唱“花儿”格外抓人。

1973年，马得林考上了西宁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故乡，成为一名乡村教师。教学之余，听花儿，写花儿，唱花儿，便是他最大的乐趣。

马得林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路途成了他即兴创作的乐园。风雪天气，想到身穿皮袄、手持符节的苏武，一首花儿脱口而出：“苏武牧羊(者)在北国，他本是汉朝的使节；年轻的时候里成双对，老了时拜下个姊妹。”为了记住和完善歌词，他就跳下自行车记在笔记本上。夏季满目青山花红柳绿，清泉潺潺鸟语花香激起了他的灵感：“六月的荷花七月里红，一朵儿为啥(者)没红？人家们谁你容易得很，我谁你好比是大海里捞针。”就这样，他以石为凳、以膝为桌，记下了无数心中的花儿。

青海花儿属于民间文学范畴，一直以来都是口传心授、代代相传。随着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逐步转型，老艺人相继离世、民间歌手自身文化偏低，青海花儿面临失传的危险。对此，马得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保护和传承这项民间艺术，每天放学后，他就走出校园，走向田间地头与民间歌手交流。白天，他向花儿歌手们学习，晚上就趴在炕桌上整理。同时，他坚持利用教学之余进行花儿研究，关于花儿的研究论文《闲话青海花儿》在《雪莲》杂志发表。近年来，他撰写的论文《认识花儿》《中国花儿漫谈》等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为全面搜集整理大传花儿，从1986年开始至2003年，马得林花了17年，开展抢救和保护。除了向民间歌手学习请教，他还利用假期泡在图书馆、文化馆查资料，将搜集到的神话传说、历史人物、风物典故等花儿作品进行系统整理。其间，他自己也创作了一部分大传花儿作品。

在马得林的家里看不到写字台，他的写字台就是炕桌，就是山涧的石头。在炕桌前的17年中，他搜集、整理、创作了1059首大传花儿。从盘古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典故、风物人情，沧海桑田，人情冷暖，尽涌笔下。大传花儿早已在西北人民中广为流传，不过将花儿按照历史顺序进行整理归类并赋予其新内容，进而总结问世，应首推马得林。



## 传承人

## 潜心创作《江南三部曲》

2003年，格非动笔创作“江南三部曲”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人面桃花》，这是他以独特的历史观并结合生命想象精心营构的力作。该小说有别于格非前期的“先锋”风格，致力于更朴素、更宁静、更温婉、更细腻地去阐释人生。在对逝去记忆和历史场景的呈现里，讲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乡村女子秀米如何辗转奋争于乌托邦理想建构的身心历程及其传奇故事。不难看出，格非意在将一个女子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厚重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简单写出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

《人面桃花》的历史背景是1949年之前，而到了“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故事的时间背景则为1952年—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小说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姚佩佩遭遇家庭变故从上海来到梅城，并与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之间发生的一段难以示人的爱情。这部作品发表之后，莫言曾经有过高度评价：“这是一部继承了《红楼梦》的小说，书中主人公谭功达就是现实的贾宝玉。”

在出版了这两部长篇小说后，格非写作的步伐明显慢了下来。经过几年的沉淀之后，他于2011年完成了“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该小说讲述了一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人近20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借以透视时代巨变面临的各种问题，解读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小说主体故事的时间跨度尽管只有1年，而叙述所覆盖的时间长度却是整整20年！

《江南三部曲》从构思、写作到最终完成，真正可谓“十年磨一剑”。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三部曲”集结出版时要起一个系列名，起初格非定名为《人面桃花三部曲》，最后以《江南三部曲》一锤定音。

格非作为学者型的作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关于文学的经典性问题，他认为：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家无非两种，一种是开风气之先，另一种是挽救风气。没有狂放之气的作家，最后只能写出平庸的作品。成不了好作家。他继而反思：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转折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狄更斯、司汤达这样反映社会深刻变革的大作家，反而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畅销书和文化商人？

事实上，格非始终在朝着文学的经典性目标努力。他坚持用规范、纯正的汉语写作，立足于语词本身的丰富性，以繁复、深邃、多层面的叙述保证意义的储留。随着年岁增长，他意识到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价值，作为汉语作家应该从传统文学中充分吸收营养。对于曹雪芹和鲁迅的作品，他反复阅读、推崇备至。

除了读书和写作，格非最大的习惯就是思考。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作家和哲学家一样，在认识世界时，哲学家使用的是逻辑性的、陈述性的方法；作家使用的是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是具体的形象。在人生多种可能性的选择中，格非最终选择了文学。他一直强调好的文学一定要有陌生化的效果，如果文学不能超出普通人的预想、和日常生活完全一致，那文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在当代著名作家中，格非小说创作的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每部作品发表后总是能在文坛引起不小的反响。除了获得茅盾文学奖，他还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鼎钧双年文学奖等重要奖项。此外，许多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对于目前的文学成就，他并不满足。在他看来，最好的作品永远都在创作中。



经拓展了、延伸了。对中国来说，有了一个向世界的出版同行展示我们自己出版业绩和状况的平台。这既是国家间文化交流的平台，也是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平台。

——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潘凯雄认为。

●其实，不是只有中国才有主旋律的。什么叫主旋律？就是一组乐曲里面最主流的这个旋律。电影也是如此。现在我们说的主旋律，实际上就是主流价值观的电影。这样的电影美国人是拍得最多的。包括《国家公敌》《公民凯恩》等等，其实都是体现美国那个时代一种主流价值观的电影。

——《建党伟业》编剧董哲说。

●电影是让人体验的，不是要有人去把它说得那么清楚的。其实，很多东西是要去感受的，它是气味，你要去闻的。好的东西去体验更重要，过度阐释反而不精彩。

——导演刁亦男认为。

●除了经济发展以外，文化是最好的传播媒介，我们不能自己好，闷在那里不说。我们的传统文化真的非常好，



但是皮太厚。比如说一件古玩，如果搁在那看，我们并不认为好，你得说出来。所以，我觉得艺术界的各个种类，绘画、音乐、戏剧，都可以有一个传统文化的国际化和本地化的体现。

——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说。

●自古以来，我们一直把文学当做自己的精神家园来看待。随着社会向市场经济发展和世界全球化的进程，文化自身的力量与经济社会相比较显得比较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在整个社会当中的作用降低了，而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弱化了文化自身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新审视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作家何建明认为。

(崔乃文辑)

●只有坚持公信力的培育，才可能推出深受中外观众喜爱的好作品，才可以造就一批优秀艺术家。只有采用最严格的、科学的评奖机制，才能尽最大努力保证比赛的公平和公正，保证评奖的权威性、公信力，保护评奖的品牌。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冯双白谈文艺评奖。

●艺术还需要有一种新的东西，有一种独到的东西，有个性的东西。比如说10个艺术家的作品摆在这儿的时候，展现10个个性，这就是艺术的特性；把一个人当成真理，把他9个全灭了，艺术绝不能这样。可以有齐白石，但是你也得有毕加索，也要有梵高，这才有意思。



## 非常

## 好声音

——北京人艺副院长、导演任鸣认为。

●生活，永远是你最好的老师。一名编剧，只有用心去品尝生活的味道，酸甜苦辣才能跃然纸上。

——编剧王丽萍如是说。

●今天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互联网的概念不仅仅是说它是一个数码的概念，而是指整个思维方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不用单一的工具去研究单一的对象，而是用一种跨文化、跨领域、跨工具的方式来面对你所面对的复杂事件。

——学者朱大可这样认为。

●在现实社会中，有些人要混在大众里面，可是有些人永远走向最前卫最先锋，那是孤独的、小众的，艺术其实都是这样。可是前卫的艺术很重要，没有这样的东西，我们今天还停留在唱一个唐朝的歌，跳一个汉朝的舞蹈。

——中国现代舞创始人曹诚渊表示。

●传统意义上讲的国际书展主要是版权贸易。而随着通讯手段的发达，现在书展的功能比原来单纯的版权贸易已